

#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

蔡之兵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做出系统部署，为明年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指明了方向。

## 认识论：我国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虽然受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在2024年遇到一些挑战，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好，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认清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这都是明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的难点。

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从2024年的发展情况看，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总体看，全球经济增速增长乏力。受局部地区热战、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面临严峻挑战，供给制约、需求不足问题交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弱。局部看，在个别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科技、金融和贸易制裁手段，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体系规则和国际金融信用基础，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是重中之重。从当前经济形势看，我国内需动力强劲，2024年贸易顺差将首次逼近1万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稳固。相比之下，我国内需尚有巨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政府投资需求，还是居民消费需求，都面临较大压力。前者因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难以保持高速增长趋势，而后者因收入增速的放缓也

日趋保守。从数据看，2024年1~10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均有较大增长潜力。

认识发展基础有利性。越是环境复杂，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善于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

从各种发展基础看，我国发展仍然具有大量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坚实支撑。

从供给能力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便利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网络，产业门类全、产品品种多、生产质量优的优势带来了巨大经济增长动能，前三季度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2%。

从市场空间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顺利进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发挥，14亿多人口的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需求潜力巨大，短板领域、薄弱环节和新领域新赛道投资还有很大空间，新消费、新基建等领域发展活力也在不断释放。

从内在规律看，经济有望不断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虽然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仍然偏低，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伴随着产业升级稳步推进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我国潜在增长率仍保持在中高速水平。2024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接近5%，环比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展现了经济的较强韧性和回弹能力。

从动力支撑看，新质生产力不断创造新增长点。我国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出现，量子技术、5G通信、新能源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正在逐步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1位，比上年提升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认识经济工作的规律性。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既不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全新问题，更不是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无解难题。针对当前的挑战，党中央提出了五个“必须统筹”，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规律认识系统性突破，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

在经济理论的认识突破上，必须统筹好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明确了研究我国经济现象和问题的理论视角。

在经济实践的认识突破上，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以及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我国经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表明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实践框架也已成型。

在经济路径的认识突破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从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如何将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深度有效结合，决定性因素就是经济路径的适宜性问题。长期以来，要“量”还是要“质”以及怎么要“量”、怎么要“质”，始终是摆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后发国家面前的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角度，对总量和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权威界定，有利于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

## 方法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是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的根本方法。

坚持“稳中求进”与“以进促稳”。坚持“稳中求进”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长期方针，多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就是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既要实现“稳”，也要不断“进”。

一方面，“稳”是“进”的基础。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和众说纷纭的舆论形势，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基调，始终瞄准聚焦长期发展目标 and 中心任务，避免政策的短期变化和频繁波动，将宝贵的政策资源集中于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确保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也要清醒看到，“稳”不是“停”，停也稳不住，强调“稳”的工作基调，意在为经济工作提供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和波动并最终实现更大的经济进展。另一方面，“进”是“稳”的动力。“稳”能够夯实“进”的基础，而“进”则能够为“稳”提供更大的动力。由于需要同时处理好多个不同领域、不同指标、不同任务的关系，实现“稳”的工作目标并非易事，而是需要进行系统谋划和周密部署的长期任务。

坚持“守正创新”与“先立后破”。近几年来，

# 做好文化和科技的“融合题”

钟君

文化之美，浸润人心；科技之光，照亮未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化和科技的每一次融合，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有力引擎，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做好二者的“融合题”，不仅将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还将开辟文化产业新赛道，有效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 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些年，科技进步对文化创新的驱动作用日益显著。以人工智能、元宇宙为例，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由2019年的375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7078亿美元，增长近18倍；元宇宙产业规模由2021年的1591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4788亿美元，年均增长70%以上。在文化和科技融合过程中，二者相互奔赴、相互促进，推动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为科技提供价值引领、创新资源和审美体验。文化是引导科技向善的关键，强调人的价值、情感和体验，促使科技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的需求和感受，为科技注入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防止科技发展偏离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航向。文化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刻的智慧和丰富的知识体系，能为科技创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意等，从而提高科技的可用性、适应性、易用性，使科技更好地理解满足人类需求。

科技促进文化形成新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产业形态。数字技术的深度运用，能够将传统文化内容转化成数字形式的文化产品。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人们可以沉浸式观览历史场景、艺术作品、文化遗产，文化体验的交互性和自主性都获得了极大提升。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提升文化的表现力，大数据推动实现文化内容的图谱化和可视化，物联网使文化场景更具感知力，智能终端、高清显示屏等数字文化装备不断衍生，使人们的文化体验更形象、丰富、立体和可接受，并实现近距离、即时化。在科技的驱动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让文化场馆“动起来”、非遗“热起来”、文物“活起来”。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文化传播空间，不断解锁多元主体共振、人机互动共生、虚拟与现实共融等文化传播新场景。

## 开辟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加速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系统性革新。特别是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超高清视频、新能源汽车电子等交叉集成，孕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人等前沿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新的产业变革，开辟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新赛道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新设施、新技术、新装备、新场景、新业态。新设施，即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涉及数据的计算能力、传输能力和储存能力。新技术，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驱动，具有速度快、精度高、功能强大等特点，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人机交互等技术。由先进的数字技术结合形成的有机体，类似一个人体结构的智能体。新装备，主要指文化和科技融合在用户终端方面打造的新型装备。在数智时代，除前端基础设施外，用户终端装备的制造越来越成为衡量文化和科技融合成效的重要标尺。新场景，最具代表性的是元宇宙场景，涵

盖文旅、教育、医疗等多领域。这些新场景最大的特点是利用虚拟技术构建互动空间，让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获得沉浸式体验。新业态，即文化和科技融合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仅新产业而言，包括音视频、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等产业迅猛发展。

这五个方面不是割裂的，而是有内在逻辑的。其中，新设施属于基础底座层，是发展新技术、新装备、新场景、新业态的软件和硬件的基础支撑。新技术属于技术研发层，是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动力源泉。新装备属于产品工具层，是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工具载体。新场景属于行业应用层，是新设施、新技术、新装备、新业态的系统集成。新业态属于形态表现层，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态。

由此可见，每当科技创新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并运用到文化领域，就会驱动文化的创新发展，二者彼此融合、双向奔赴将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延伸文化产业链，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更加深刻地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更新。

## 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多、标准更高。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将赋予传统文化艺术新的创作内容、新的表现形式、新的体验与感受，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支撑。

一方面，有利于弥合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鸿沟”。当前，在我国文化消费领域，城乡、地域、代际之间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文化和科技融合有助于扭转这一现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能有效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有效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将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到达率、及时性，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精准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文化消费升级。当前，人民精神文化消费呈现更多样化、内容创意化、体验沉浸化、媒介智能化、时空虚拟化等新趋势，亟待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丰富文化消费总量，优化文化消费结构，提升文化消费质量。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产业，促进高新技术广泛渗透到文化产业的生、产、传、播、消、费、体、验各个环节，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文化消费需求。传统文化产品、同质化产品服务目前已难以满足Z世代消费需求，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将创造更多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提供更具个性化、智能化的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年轻群体文化消费新需求。

综合看，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文化作为精神生产力一旦充分释放出能量，将会对物质生产力产生强大驱动作用。走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之路，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对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又要发挥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制约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瓶颈问题；坚持守正创新，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让科技为文化赋能、文化为科技铸魂，确保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 中华文明的文化解读

官正

长期以来，学者习惯于把东西文化差异理解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对立，并进而认定中国作为大陆文明的代表，表现出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保守性，欧洲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表现出游牧文化的进取和扩张性。这一观点从洋务运动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都曾经是一个广泛的学界共识。当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政治、文化的领航者时，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来源于大陆文明的保守与自给自足，则无法解释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领导者这一事实；重新思考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 海洋文明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商业文明

人类最早的文明产生在北半球中纬度的季风区——北纬20°至40°地区的大河流域，包括尼罗河、中东两河、印度河及黄河、长江流域。基于人类共同起源于东非智人的学界共识，远古智人沿东非大裂谷向北进入尼罗河谷、巴勒斯坦地区、两河流域上游的谷地，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随着远古智人人口的逐渐增长，那些无地可种、无草场可放牧的族群不得已到周边的海岛上学谋生，他们只得靠渔业和海上运输来贴补日常生活所需。东地中海地区作为尼罗河三角洲和西非裂谷地区，以及两河流域上游谷地的连接水域，成为各地物品交通的便捷路径——这最终成就了克里特岛文明。这是古代希腊文明的开端。可见，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发端，它并不源于游牧文明，而是源于克里特岛的商业文明。古希腊人依靠渔业和海上贸易的生活方式比农耕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见，冒险意识并不是某个民族的天性，而是恶劣生存环境对生存于此地的族群影响的结果。

## 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等多元文明的统一体

所谓海洋文明不是说人类以海洋资源为生，而是那些缺少农耕和放牧条件的族群，通过水上运输来讨生活。海洋只是起到了水运交通的作用，如果不是海洋而是密布的内河，会比海洋更好地起到交通的作用；因为河流中的风浪较小，更便于船只航行。中国先秦时期的江淮地区的水运与商业活动是东亚海洋文化的表现形态。东亚的文明，既有黄河下游的农耕文化，也有黄河上游的牧耕兼济的草原文化，也有长江下游河湖林立、江海一体的渔耕文化，也有长江上游冶铜加农耕的古蜀文化。中国良渚文化遗产被收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性的一个佐证。

在秦汉以前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从商灭夏到周灭商，秦灭六国，再到秦汉兴亡，从地理纬度来看，基本表现为东西方之间的对垒。生产方式是一个以陇山为界，西牧东耕的生产方式。自三国以后，由于东吴对江南的开发，中国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变为南北之间的分野，人们对生产方式的看法也变为一个以长城为界南耕北牧的格局。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南部农耕民族的侵扰常常止于淮河是因为南船北马的交通工具，这些族群带着冶铜和制作马车的技术向周边流散。古印欧人的冶铜和养马技术沿草原从西藏高原传到了黄河流域和古蜀国；欧洲人和东亚人也是东非智人北进后不断流散的产物。也就是说，无论东西方都是智人的后代，人们处于同一跑线上，差异只是生存环境和适应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不是人种与习性的差异。

欧亚大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明确。欧亚大陆自南向北平均气温逐渐下降，水资源不断减少，植被也由树林变成草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由农耕转为游牧。因为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才适合农耕，400毫米以下只适合牧草生长。于是，400毫米降水量线成为欧洲大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长城是东亚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长城以南是黄河流域农耕区，长城以北是蒙古草原游牧区。天山是新疆地区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中亚五国大致以阿姆河为界，在里海和黑海之间，以高加索山地为分界线。在欧洲，以卡尔巴阡山为分界线。

海洋文明不是渔猎成就的文明，大陆文明也不是农耕成就的文明。它们均服务于农耕文明群体的商业文明；商业群体所实现的商品交换，以及蕴含在商品与人员交流中的思想分享过程形成了人类文明。由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四个古文明中，尼罗河流域文明曾辉煌一时，但现已消失。两河流域文明虽产生时重要的文化影响，却因频繁的民族更迭而缺乏连续性。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虽非常古老，但后来被雅利安人征服。人类现存的四大古文明仅存的只有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等多元文明的统一体

所谓海洋文明不是说人类以海洋资源为生，而是那些缺少农耕和放牧条件的族群，通过水上运输来讨生活。海洋只是起到了水运交通的作用，如果不是海洋而是密布的内河，会比海洋更好地起到交通的作用；因为河流中的风浪较小，更便于船只航行。

中国先秦时期的江淮地区的水运与商业活动是东亚海洋文化的表现形态。东亚的文明，既有黄河下游的农耕文化，也有黄河上游的牧耕兼济的草原文化，也有长江下游河湖林立、江海一体的渔耕文化，也有长江上游冶铜加农耕的古蜀文化。中国良渚文化遗产被收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性的一个佐证。

在秦汉以前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从商灭夏到周灭商，秦灭六国，再到秦汉兴亡，从地理纬度来看，基本表现为东西方之间的对垒。生产方式是一个以陇山为界，西牧东耕的生产方式。自三国以后，由于东吴对江南的开发，中国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变为南北之间的分野，人们对生产方式的看法也变为一个以长城为界南耕北牧的格局。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南部农耕民族的侵扰常常止于淮河是因为南船北马的交通工具，这些族群带着冶铜和制作马车的技术向周边流散。古印欧人的冶铜和养马技术沿草原从西藏高原传到了黄河流域和古蜀国；欧洲人和东亚人也是东非智人北进后不断流散的产物。也就是说，无论东西方都是智人的后代，人们处于同一跑线上，差异只是生存环境和适应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不是人种与习性的差异。

在难度上，要针对关键领域进行系统性部署。结合当前发展实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个方面的重要任务。从这几方面任务面临的挑战看，明年经济工作应坚持系统思维，坚持精准发力，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和外部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针对企业经营中的关切诉求，加强政策支持和优化监管服务；针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持续用力推进风险处置。要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效能，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在力度上，要进行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最新经济方针，是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变化和破解国内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有效提振各经营主体信心，明年应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与此同时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此外，还可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另一方面，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进一步提高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在态度上，要确保各项工作部署的高水平落实。不能实现2025年经济工作各项目标，关键在于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一方面，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要强化正向激励，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求真务实，坚决反对热衷于对上表现、不担当不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敢干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期管理，立足当前社会存在的典型悲观预期，联合多个经济决策与舆论宣传部门，系统性地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加快推动形成积极正面的社会预期。（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